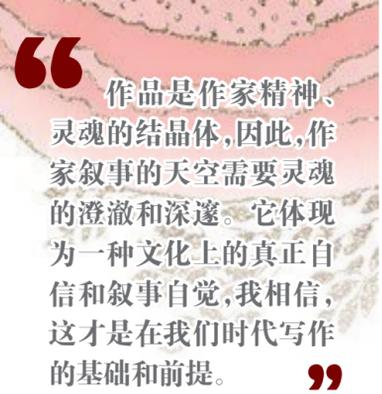




文化自信、叙事自觉与精神维度

——近五年短篇小说阅读札记

□张学昕



一

从一定程度上讲，近百年来，杰出的长篇小说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时代文学的“风向标”“里程碑”“全景式史诗”“主干话题”，或体现着历史、现实、社会、人生和存在世界重要的“症候”。当然，这个维度固然重要，我们时代的文学也需要既宏观又微观地整体把握世界的范式和规模，具有开阔的文化、精神、人性视野，令作家尽可能充分地展示出更大的叙事可能性。相比之下，短篇小说的文体及其写作，虽然偶尔略显“寂寞”，但它从未从主战过。这种文体常常以“抚古今于一瞬”的姿态，不断地展示着其迅速地捕捉、把握生活，并穿越表象世界的细部修辞而直逼“本质”的能力。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短篇小说与其他文体一道，时时引领文学的潮流和风骚，更从未“掉队”和“落伍”。我在谈论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短篇小说时，曾提及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制约，作家的叙事能力明显暴露出相对虚弱的倾向。作家在所谓“全球化”“现代性”“商业化”的环境和语境中，一度陷入某些“个体经验”的覆盖之内，“时代性”经验匮乏，超越现实的激情减弱，拥有独特生命体验的可能性渐显微弱。那时我们所忧虑的，不仅是文本里的故事、人物及其情感状态日益变得乏善可陈，重要的是作家的“看法”也变得缺少“见识”。而文本一旦丧失对现实存在、经验的甄别，变成对生活的简单模仿，其生命力也就可想而知。对于经验的无从把握，无疑给当代小说艺术创新的可能性造成极大的“缓冲”。如果说，长篇小说尚能依赖叙事长度得以“缓冲”，给作家从容讲述内心、展开情节和更多人文内涵，并规避叙述缺憾而显示技术蕴藉的机会，那么，短篇小说既没有时间上的阔绰，也不允许空间维度上的肆意铺张。因为，短篇小说既要经验的鲜活，也要求结构、语言的智性品质。所以，小说的叙事方向以及它所承载的使命，已经不是简单地书写作家与大众相近、相同且熟悉的生活场景，而必须是超出一般经验的独创，去发现我们这个时代人性、精神和灵魂深处的真实状况。就是说，小说家必须通过自己的文本，“简洁”且“浩瀚”地揭示和探查到此时代社会、生活、人性内部的细节和真相，再现时代生活的波澜万状。那么，在这样的理论前提和背景下，考量近五年的短篇小说实绩和创作面貌，将其置入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和发展的“新时代文学”范畴之内，且在审美自觉的维度上，梳理、整伤短篇小说所取得的成就，总结其价值、意义，不啻是对这种文体的重视和敬畏，更是检验我们时代文学内在品质和发展趋向的关键。

当然，我们需要重视的，仍然是短篇小说写作如何在主题、叙事气度、叙事方法、艺术表现方式上，努力摆脱域外小说经验和前辈作家母本的巨大影响和精神负担，原创性地奉献出富于“本土化”文化“原浆”意味的文本，这一点意义重大。那么，短篇写作，无论在精神层面，还是技术、美学层面，就必然会出现鲜见的叙事难度。不仅如此，人们对短篇小说的品质要求，似乎从来都是明显高于长篇小说。倘若这样理解不向文体的接受美学，也就不奇怪有些人为什么能够容忍数百部乃至上千部长篇小说“泡沫式”制作所产生的“垃圾文学”，而不愿降低短篇小说欣赏和评价的标准。说到底，近些年来，作家们仍然在努力地摆脱掉焦虑，回到现实中来，不断地探索和寻找表达现实的可能性，找到本该有的叙述自信。坚持我们应有的文化立场，个人经验和叙事姿态，让叙事抵达时代的深处，让我们对生活真挚的内在情怀，切近时代最具特性的情境，满怀自信地发现、破解生活表象背后的存在价值，以及那些令人焦虑、隐忧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

讲，短篇小说写作应该深描出历史、现实生活、人的命运在我们时代的变迁，对其做出耐心、从容而精到的叙述，显示出文化自信和叙事自觉。

二

检视近五年来的短篇小说，我们看到，直面现实的艰难、复杂和荒诞，深入人性细部，勘察世道人心，显示当代人的命运和境遇的作品成为“主流”倾向。尤其是，切入、感受“底层”和普通人的生活，描述对现实世界的悲悯对人的尊严、隐痛、困扰、自强不息及其希望的文本，深深地嵌入到人的精神、灵魂维度。因此，表现时代生活活动不黏与人性和现实的关系，构成近五年短篇小说写作实践的主体和主题。这一主题与其他方面的叙事一道，扇形地打开了叙事和想象，支撑着这个时代文学应有的担当。

刘庆邦的短篇小说《泡澡》，似乎就是要在最平淡、“几乎无事的悲剧”故事中，彰显通透现实的力量。在细小的悲欢中体味人生的酸楚和尴尬。叙述更加体现出作家宽柔的人间情怀，对俗世生活“结庐人境”的素心慧眼，呈现、铭刻普通人的存在状态和人生经验的耐心。文本的字里行间，着力地演绎“小人物”的喜怒哀乐。一个失去老伴的退休老人的苍凉晚景，牵扯出老年处境的尴尬和精神“病理”，也深刻地触及一个人内心最柔软、最脆弱也最执着的自我尊严维护的念想。弋舟近年在短篇小说文本中，坚持依靠心智或小说本身的智慧，丰富自己内心所感悟到的那些真实，细吟密地捕捉生活的品质和内蕴。他并不想为这个复杂的世界进行某种预设或重新“编码”，而是在自己的精神趣味里，选择自己已发现、表现生活的角度以及审视灵魂的方向。因此，借助叙述，穿透人的表层生存状况和生存行为，沉潜到作为存在主体的人及其人性、灵魂的最深处，成为为弋舟写作的叙事伦理。继《出发》之后，《巴别尔没有离开通天苑》《人类的算法》等文本体现出弋舟的世界观和审美观的调整、变化，弋舟借此实践着他的小说理念。当然，小说不是从理念的视角进行叙述和书写，而是要实现和完成对于人之心、人性的深度开掘。如此，才能体现出叙述本身诊察人性的力量。储福金的短篇小说被称为“棋小说”，以棋理表现人生、命运、人性之理。与以往不同，《洗尘》中，围棋作为直接“背景”或“氛围”开始渐行渐退。但是，围棋依然像一张罩住年轻和岁月的人生之网，将人物的悲欢离合、俗世生活，如围棋之道次第展开，透视出人生如棋的隐逸辉光。似乎是一种宿命，储福金已无法在文本里与围棋“了断”，围棋成为其写作的文本的某种必然。这篇耐人寻味的小说从个体人生的角度，试探我们时代生活的精神“水域”。这里虽未深涉道德、伦理的敏感地带，却是直击人生选择和灵魂考古。青年作家班宇的胆识和勇气令人惊叹。他的写作驱动着叙述从沉重的淡然而，向着突如其来情感裂口引发心理和精神“炸裂”，扭转事物的因果或意义而奔向另一个精神向度，而这常常使我们的阅读始料未及。《肃杀》让我们感知到一种不易察觉的内心疼痛和忧伤，充满着缓缓、令人无奈的悲伤的苍凉况味。小说中11岁的“我”直接目睹、见证“我爸”这一辈人不幸悲惨的现实命运和人生境遇。无疑，父辈的命运，客观上，是由时代“决定”的，自然是必须直面的沉重现实。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班宇的文本，是“东北叙事”，又不唯“东北叙事”。它提供给我们的是时代整体性的心理、精神和灵魂的档案。班宇在不意间，已经超越东北历史和现实的文化、心理、时空交错的地缘背景，叙写出对当代世界的现实关切。

生活如此复杂，人性如此深邃，小说家都会有自己倚仗的逻辑。生活的逻辑明明是这样，但

作家可能不会按照生活的逻辑去“结构”生活，而有意打破我们通常的、惯性所引导的“常识”。像王祥夫这样的作家，就会在自己的叙述里“一意孤行”，写出最贴近生活本身的悲喜剧。《电影院轶事》《大澡堂》《生死契阔》《天堂喇叭》，都是近年非常优秀的短篇小说。看上去，他在小说里描写的小人物要困难一些，并不轻松。因为小人物的心里和欲望与现实生活不容易兼容和默契，他们所谓“本分”的背后可能就是固执和愚顽的另一种总结。所以，这些会有让读者产生困惑和不自在的元素，正是人物的现实之痛。也许，好作家都会找到自己灵魂的“七年之痒”，切实传达出对生活和人性的理解。马晓丽的《陈志国的今生》与其以往的创作在题材方面大异其趣，叙写一只狗与人之间发生的故事，但在内在精神上仍保持一贯的追求。小说在呈现人性与“狗性”的较量中，张扬着对平等和尊严的恪守。

劳马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合唱》《坐在紧急出口处》和《请帮我找个好司机》等，其叙事就像无意间的“藏拙”，哲理性和诗性在充满戏剧性、喜剧性的场景或语境中，显示出独立独行、不同凡响的小说理念。文本以形式打破形式，以内容撞击内容，通过表象呈现深邃，诠释生活和人性的内涵，故事亦引人入胜。王手的《平板玻璃》描述主人公40余年商海的沉浮经历，既见证当代社会历史的跌宕起伏，也呈现出个体生命的尊严和命运。次仁罗布的《红尘慈悲》显示出这位藏族作家对短篇文体“简洁而浩瀚”的美学追求。虽然文本只是讲述藏族普通一家人的生活，却着力凸显出家庭里每个人，尤其是女性的善良、宽厚和悲悯，以及他们对生活、命运的隐忍。王手一向度体现出生命内在心灵美好的光泽与高尚灵魂的通约。陈昌平的《耳光》是一个关于人性、尊严的故事。写一个医院护工被迫接受垂危患者的请求并发出誓言，由此面对着一个看似简单、实则难以完成的任务。护工不断调整、降低自己的目标，力图把这个任务“圆滑”过去。即便如此，这个在尊严里挣扎的小人物也难免遭遇悲惨结局。这是一个很容易写成药德“劣劣”的作品，但作者没有在贫富之间作简单的道德判断，作品穿透表象，直抵内心。

阿成的《除夕的夜》、艾伟的《演唱会》和《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葛亮的《暮色》、张惠雯的《梦中的夏天》、罗伟章的《所有人都想离开》、袁山民的《调整呼吸》、女真的《老女新手》、晓苏的《父亲的相好》、张翎的《都市猫语》、木耳的《瀑布守门人》、李铁的《送韩梅》和《她走》、高君的《天空》、蒋一谈的《发生》、刘建东的《删除》、万胜的《执子之手》和《摘钩》、吴君的《家庭生活》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写出了生活的沉重和深广，也写出了我们时代人性的真实状况。

三

我相信，作家在生活中获得经验并使之在叙事中发生升华有多种途径。在短篇小说中，故事的讲法、悬念的制造、智性的有效传达，甚至叙述语言和其他技术的精致、精到运用，直接影响和控制着小说整体的底蕴和质量、品质。写作中对这些因素的强调，可能出现“负面”的效应，产生“练达”与“匠气”。但“匠气”若不拖累小说家的个性和独创的“匠心”，就能消除小说“做”的痕迹，而能顺势赋形，顺其自然地“贴”近生活，其实更能够展示作家的艺术天分和才华，从而达到审美效果应有的深刻寓意，产生寓言品质，又洗净铅华，且富于清逸、飞动的“神韵”。这既是想象力的胜利，也是作家在精神、心理和灵魂层面的自我超越。这一点，近几年在不同的叙事题材上，都有创新和拓展。特别是，作家在直面现实、“走进”并反思历史时，两者构成硕大无比的“张力”和叙事的弹性空间。小说不是历史，作家将叙事的起点定位在何

处，需要进一步修正以往的叙事理念，需要重新认定自己的修辞美学。因此，文学呈现、再现历史，既不能“解构”也不能“虚化”“虚无”，而应该“重现”或“复现”，将当代理想与情怀嵌入历史、现实和时间深处，生成更大的意义空间和精神价值。

迟子建的《炖马靴》和《喝汤的声音》堪称近年短篇小说的佳作。作家以深情而深沉的笔触叙写出东北历史和现实中的俗世人间和前世今生。《炖马靴》描述东北深冬大森林里的雪涛之声，抗联战士与日本兵、两只母子狼之间所进行生命博弈的历史“回放”场景，清晰而震撼。一个抗联的老故事被迟子建写出如此深邃的生命哲理和人生感悟，它聚集相当大的容量，将历史、战争、战争、生命和人性都埋藏在这个短篇里。生命之间是可以交流的，善良和感恩应该是灵魂的伴侣，惟有一个杰出的短篇才会有如此坚硬的精神内核，令我们无法忘记那位抗联战士与那只瞎眼之间的故事。有时高等动物会丧失善良的品行，而低等动物却柔情备至，令人惊诧，不可思议。人与狼、人与自然的这种“对话”就是要让人类反省自己，重新审视自己，审视人性的变异。《喝汤的声音》向我们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历史和个人的“双重记忆”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小人生，大历史”的叙事策略，或者说，它的叙事从个人走向历史，走向生命、人性、命运的深处，他们都显示出迟子建的写作在历史和现实之间的游戏与变幻。迟子建的“文学东北”叙事，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力量、地域经验和人性锋芒，她的文本渐次打开充分而饱满、深邃而旷达的历史和当代现实的审美空间，其书写的“东北故事”背后，蕴藉着广阔、复杂、变动不羁的大历史积淀和沧桑。

钟求是的《瓦西里》讲述一个将历史、现实、记忆、理想熔于一炉的青春故事。小说叙述两代人在彼得堡相遇，通过讲述和倾听、经历和想象，爬梳了革命和青春的记忆、他们成长的历史。试图让曾有过的“现实”，反抗对他们历史的“遗忘”，唤醒理想或重构新的生活。这篇隐含深层“革命”和浪漫的小说，从另一维度将我们引向沉重的历史深处。邱华栋短篇小说《剑笈》的背景是乾隆皇帝让纪晓岚编修《四库全书》，部分情节取材自《古今怪异集成》，叙事把刺客和侠客置于某个著名的历史事件中，并对历史情景进行重新想象和再度“结构”。小说以其细部修辞的精到和魅力释放出人物及其命运在大历史风云中的形销骨立或特立独行，这一组小说或许该算是“新历史武侠小说”。《剑笈》《击衣》等小说，可以视为邱华栋小说写作的新“爆破点”，在其中能够感受到文字背后作家灵魂深处对于生命、命运、人性感知的情怀和丝丝缕缕的灵感微光。

作家对于历史、现实和人的生命理解的深度，决定一部作品的品位高低和精神价值大小。它并不取决于题材本身，更多的是受制于作家的价值取向、审美维度和叙事伦理诸种因素。这也直接关系到叙事文本对于历史和现实的超越性。上述几位作家在当代现实的语境下，是否要重新“链接”起现实和历史之间的粗糙或默契，在某种程度上，可谓“别出心裁”地拂去经年的尘埃，发掘、显示出历史“原生态”的“青涩”、幽微和曲折。

四

不可否认，一些实验性较强的小说，需要我们的认知装置能够打破读者审美预设的意图，领悟到叙事形式美学背后的玄机 and 意蕴，发现其不可低估的美学价值和意义。如此说来，有些作品可能是要疏远一部分读者而青睐另一部分读者，产生审美接受的分流。像苏童、叶弥、鲁敏、王隼峰、朱辉、哲贵、李浩、东君这一类作家，往往凭借纯熟和练达的小说技术、深厚的审美潜能，使小说充满鲜活的浪漫气息。他们的叙述典雅、别致，我们从中既能读出生活的韵味、命运的玄机和精神的尊严，同时也能感受到，他们都竭力通过叙述实现对生活强烈的超越愿望。这些年，他们的写作都表现出不凡的个性和艺术探索精神。我们知道，从契诃夫、莫泊桑到雷蒙·卡佛、博尔赫斯、契弗等领域外短篇小说大师，无不在文化、精神、心理、审美形式这些层面，释放出自己的艺术才华和思想力量。而将这些元素整合到最高境界，确是所有作家的梦想和诉求。小说的虚构本性，不仅决定“经验”的有限性，而且要求作家必须冲破认知上的局限性，而小说有别于“非虚构”，具有深广的隐喻、象征等引申义的优势，又给叙事提供更多的腾挪空间。因此，想象和幻想的品质，在小说中，尤其短篇小说中就显得极为重要。而想象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感受和经验的平淡无奇，使写作创造出“此类”经验的“唯一性”。换言之，如何以灵动的视角，发现、展示存在世界和现实生活的种种错位和乖张，让那些貌似平淡无奇、不露声色的文本产生内在张力，获得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精神深度、寓言含义和独特韵味，是小说艺术审美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短篇小说有限的字符，其实就是对作家创造力的挑战。即挑战作家的想象力，才会使写作更赋有激情和某种使命。若想打通现实和幻想的边界，需要作家奇异的思维，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要像“摆弄”、整合小说中的各种元素，解决作家自身感受、判断、经验对现实世界的把握和超越，必须要具备自己从内心发出的气魄、格局、理性和穿透力。也许，这就需要对待日常生活和现实做出“化腐朽为神奇”的处理、想象和虚拟。

《玛多娜生活》再次显示出苏童对短篇小说文体出色的驾驭才能。其实，这是一篇表现现实世界中“角色虚无”的小说。人在日常生活里扮演成功者角色——像巨星玛多娜那样的渴望，可能在我们的血液中潜滋暗长，但这种欲望在很大程度

短评

创新中飞翔

□金敦

魂。纵观彭名燕许多作品，细节丰富，是她的强项。她柔弱的肩膀扛起首部中国“以受助者为中心”内容的长篇报告文学，与其说是担当与使命，不如说是作家被平凡人的大情怀激发起热泪在往外流。这部书有太多细节，如用假币买了大爷红薯的女孩，每每想起大爷那双黑粗的手，她会极度不安，在忏悔中投入了救助苦难者的行列。类似这样鲜活的细节，书中俯首即拾，人性美油然而生。读者无不从书中细节打动内心的柔软部位，商品经济社会里，人们没有浪灭真善美的人性品质。

小说与报告文学是两种不同的创作体裁，它们在素材取舍、构思结构确立，及创作手法内容上，相互转化有极大的反差难度。报告文学不像虚构的小说那样天马行空，报告文学的特性是报告与文学性结合起来，有理有据，在大量的真实素材基础上，需要合乎情理的文字描写和想象，才有报告文学要表现的艺术张力。否则，不伦不类，失去报告文学的特性。小说家彭名燕面临巨大压力，素材庞杂堆积如山，繁琐如碎片，太多的故事竟然拎不清了，不像写小说那样任思绪发散出去。彭名燕直面创作困惑敢于大胆创意，把她独有的小说文笔和意境，影视的故事结构，幽默婉约的小说叙事，揉入报告文学的结构里。突出作

家独特的视角，救助者实际是把动物体力的强悍，敏锐的嗅觉，超快的速度，灵活的适应，咬住青山不松口的坚毅，与人性的善大善交织在一起，才出现马、狼、鹰、牛、虎、鸽等吸引眼球的形象，仿佛处在疲惫中一杯龙井下肚，骤然提起神来……显然，彭名燕写出的这部风格独特的长篇报告文学，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创作实践和奉献。

正如评论家梁鸿所言：“彭名燕是为国家宣传，为人民担当，为深圳写心。这部作品追问在苦难与文明交叉的地方，人性如何绽放，有比较强的抒情性。”阅读这部书后，可归纳出彭名燕自身创作素质的三个特征：她的艺术感召力特别强大震撼人心，她的艺术审美力特别细腻有敏锐质感，她的文学感悟力在丰富细节中蔓延。这些写作特征，构成她的作品耐看、好看，有一股呵成的酣畅淋漓。

彭名燕的文学语言有她自身特点，有女子的善意柔情，有侠女的侠骨柔肠，形成她的语言风格。如书中一些小标题：一匹穿着“红舞鞋”的“千里马”、用仁义之光温暖着星星有诗意、挂在泪珠上的彩虹……这些生动形象有诗意的语言，竟出自她手笔之下，让人惊叹她艺术素养的沉淀与升华，磨砺了半个世纪的苦心锻造，才有如今艺术的炉火纯青。

人过古稀，女作家彭名燕笔耕不辍，一部30万字解读中国救助的报告文学《用爱吻你的痛》出版。彭名燕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从事演艺工作于1987年，期间，她萌发出专业从事文学创作的念头。1980年起，她出版长篇小说、散文随笔集等20多部。

彭名燕创作激情饱满，眼眸清澈晶莹有琥珀色的光芒，这光泽是作家爱心与睿智的性情流露。读《用爱吻你的痛》这部书，发现彭名燕的创新意识浓厚，勇于把小说家的想象力植入报告文学创作中，开创属于她的报告文学写作方式。开篇给书中几位主要人物做了漫画式描写，拟人化改为动物化，用马、狼、鹰、牛、虎、鸽塑造人的形象，让作品与读者一下热乎起来。可见她写作手法灵动灵活，人物塑造上别具一格，有女性调皮的笑容，有男性宽容的神光，超越模式化的新创意，让作品可读性和文学性跃上新台阶。

书中，最触动人的是塑造了中国民政一批有血有肉、关键时分生龙活虎冲锋在前的英雄形象。这些英雄分布在社会各界，有义工、社工、公安人员、城市管理者、街道办事处、普通市民等，他们平凡得像一滴水。塑造出“千里马”杨小明，深圳市救助管理站基层干部付新生、杨立君、张维文、李佳副站长，廖云辉、陈肖月等当代共产党人形象。用书中《救助者之歌》的诗句，“有爱的世界才精彩，越爱世界越精彩”来表现这些平凡中的英雄，更为贴切和暖心。

大时代呼唤大作品，演艺界与文学界隔河相望，有千丝万缕的亲缘关系，这就是文学的



迎接第十次全国党代会 新篇章